



法朗士短篇小說集

作家出版社

法朗士短篇小說集

趙 少 侯 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法朗士短篇小說集

趙少侯 譯

*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五七号
北京東四头条胡同四号

北京新華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字數：119千

開本 31''×43'' 1/32 印張 $6\frac{3}{8}$ 插頁 3

一九五六年七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七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00001—12000

定價(●)0.59元

插圖說明

插圖十幅根據巴黎 Calmann-Lévy 1948 年出版的法郎士全集本
插圖复制。“克爾比爾”、“黎蓋”、“托瑪先生”、“布特瓦”、“領帶”
等篇插圖六幅為法國勃洛 (gabriel Belot) 木刻;“市政長官”、
“復活節的紅雞蛋”兩篇插圖為法國加萊格勒 (Carlègle) 構圖、拉
都 (A. Latour) 木刻;“鐵衫”插圖兩幅為法國米朗多 (Mirando)
構圖、包傑 (Baudier) 木刻。



法朗士画像

瑞典 安特奈斯·卓恩作

前 記

1

从十九世紀末叶到二十世紀初期这一段長时期內，阿那托尔·法郎士的天才的丰富的小說和政論以及他的抗拒一切反动势力經久不懈的社会活动，对法國所有求進步的人民起着推动和啓發的積極作用。毫無疑义，他是拉伯雷、蒙田、服尔德的光輝繼承者。是他把法國傳統的民主主义的火炬从左拉手中接过来，保持着它的純淨而旺盛的火焰交到巴比塞和罗曼罗兰的手里，为今天法國的進步的战斗文学打下了基礎。

他是个唯理主义者，但他的唯理主义不同于一般的唯理主义：他并不庸俗地、机械地單憑理性來武断肯定这些或那些教条、理論和思想体系。正如高尔基所說，“他是一个把理性当作獅子和蛇一样來訓練的理性主义者。他喜欢和它玩耍，和它爭辯，他逗弄它，挑撥它。”因此

他最善于打击習俗公認的流行真理，善于揭露他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的种种非人道、不合理的現象和本質。

他也是怀疑主义者，但他的怀疑主义并不是那种对人对宇宙漠不关心，而一味否認一切的消極的怀疑主义。他的怀疑是極大智慧的表现。他的怀疑主要是社会制度的不合理的反映。他怀疑社会制度、怀疑人生、怀疑人类的信仰、怀疑一切道德觀念。这种怀疑主义对腐朽的社会制度有巨大破坏作用。由于对事物勇于怀疑，他的嗅觉便愈來愈銳敏，他的辨别力也愈來愈犀利。他终于清楚地發覺了資產階級的虛伪和殘酷。另一方面，由怀疑而產生的探討真理的要求便使他更信賴科学，使他有可能通过孔德和达尔文的学說，终于接受了科学的歷史唯物主义的觀點。

但更重要的是他的人道主义。虽然他是資產階級人道主义的代表人之一，但由于他是全面地、深刻地和人民的精神联系在一起，他的人道主义便不局限于同情和憐憫貧困的劳动人民，也不限于依靠少数人的力量去拯救人民，去改变社会。他从無数次無產階級的革命中已体验到人民集体的偉大力量，他的人道主义漸漸發展为推动这种集体力量來改善社会的一种因素。因此在資本主义發展为帝國主义階段时，他以七十七歲的高齡并不甘心閉門閑居，毅然站到無產階級的战綫上來，满怀信心地加入了法國共產党，那时（1921年10月），法國

共產黨誕生還不到一個月。

2

法郎士生于1844年，卒于1924年。他的父親，法郎索瓦·狄卜原是個農民，曾在查理十世禁衛軍里當過四年兵。退伍後在巴黎某書店作店員，最後才借了債自己在塞納河畔開設一家小書店，以收集大革命時期書籍圖片名人手迹而出名。常來的主顧都稱他為“法郎士老爹”（可能是法郎索瓦的簡稱）。他的經濟狀況一直是不富裕的。他的妻子也是農民，娘家世代都做磨工或皮鞋匠。

阿那托爾·法郎士便生于這樣一個家庭里。書店對面是魯佛爾陳列館——科學藝術珍寶的儲藏所；書店面臨着麻拉蓋街，是條小商店和平民雜處的鬧市；店里往來的顧客却很多是當時的名詩人名作家。法郎士的童年以及青年是在這樣一種環境里度過的。

法郎士的父母都亟亟于要跳出小商人的圈子，他們的唯一希望就是他們的獨生子阿那托爾。他們省吃儉用讓兒子去受資產階級的教育。法郎士所進的斯塔尼司拉斯公學是個費用很大的教會學校。學生大都是貴族巨商的子弟。他們的生活習慣和穩妥無憂的前途使法郎士脆弱的兒童心理上發生無限的感慨和羨慕。因此他在學校里一直是個沉默寡言、埋頭用功的孩子。由于在父親店里，接觸的都是文人，他唯一的雄心就是將來當一個大作家。

因此他也就特別致力於古代的文学，数学則常常不及格。

畢業后他無力再上大學，馬上走上了謀生的道路。最初是向各報刊投稿，一度还在某中學當過管理學生自修的監學。二十三歲那一年，他由一個同學的介紹替一個研究古代碑銘的刊物長期撰稿，收入雖不多，但生活比較穩定，並且對他的古代文学的知識也有極大的幫助。他和同時代的青年一樣，很喜欢作詩。當時正是巴拿斯派全盛的時期，他所寫的一些唯美主義的詩很得巴拿斯派大師勒貢特·德·里勒的贊許。由這位詩人的介紹他進了當時頗有聲名的勒邁爾書店。1872年，這家書店對他有了更大的信任，委托他編輯巴拿斯派詩選的第三集。不久他的詩集“鍍金的詩”和詩劇“戈蘭特的婚禮”也出版了。由於巴拿斯派的推許和贊揚，這兩部書使他在文學界獲得了相當的聲譽。但此後他卻不再寫詩而專致力於小說。“約加斯特和瘦貓”和“波納爾之罪”引起了資產階級文學批評家的重視，他的聲譽和社會地位便一天高似一天。1886年，巴黎資產階級的大型報紙“時報”請他主編文藝批評，另一家大報“世界畫報”也請他作長期特約編輯。從此他成了文學界的名人。當時的文藝客廳也都爭取他做座上客，他已踏入“上流社會”的門檻。他不久和一位巨商的女兒結了婚，有了一個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家庭。他那時雖然不是一心一意為資產階級服務的文学家，但至少已成為許多資產階級的文學批評家所欣賞而加以支

持的名小說家和文學批評家了。

从 1870 年至 1890 年这二十年内的法郎士，正如高尼沃所說，“是迷失了路途，徜徉于資產階級思想和生活的环境里。”法郎士晚年談到这一段生活时，也聊以解嘲地說：“我的开端是不大有什么目的的。”

3

法郎士重新回到人民隊伍里來是經過長期的思想斗争的，这是十分可以理解的。第三共和國成立以來，在法郎士个人的地位生活方面固然是一帆風順蒸蒸日上。但是目睹整个社会的动荡和人民的疾苦，他的人道主义，特别是怀疑主义不能不促使他深切地思考，追求灾难的根源。他不能看着一切危害人民、危害共和國的現象日益發展而無动于中。那时愈來愈殘酷的經濟压榨使劳动人民陷入極端的貧困，中產階級也逐漸衰落瀕于破產。掌握政权的金融寡头把國家机关看成他們掠夺財富的武器：对外無限制地擴充殖民地，奴役或屠殺落后的人民，对内加稅，加强对工人的剝削，鎮压罢工，迫害進步的人士和組織。內閣部長和議員的貪污腐化發展到產生巴拿馬运河的案件（有 104 名議員公然受賄）。思想領域內，則教会的反动势力以哲学中的唯心主义者的面貌猖狂進攻。資產階級的文学批評家公然提倡愚昧主义來抵制科学。这一切都是一个人道主义者，尽管是資產階級

的人道主义者所不能容忍的。

另一方面，若來士創導的社会主义在法國工人中間已有了一定的基礎。工人階級虽還沒有健全的組織，但已成為一種巨大的力量。法郎士不再自滿于悲憫勞動者的無知愚蠢而逐漸體驗到無產者的智慧和集体的力量。他本以為自己依附的是一個上升的進步階級，但是1890年的資本主义已接近走入帝國主义的階段，憑他的銳敏的感覺和極大的智慧，他已窺見資本主义面具背後的那付腐朽的猙獰的面孔。他十分痛心十八世紀的資產階級革命的成果竟變成1890年的這樣一個毫無共和主义气息的共和國。

他在那時期寫的小說里，如“貝鐸克皇后的燒烤店”、“瓜納長老的意見”、“泰依思”等書里，已一鱗一爪地透露了他對教會、對社會制度的懷疑和指責，已部份地否定了資產階級。但是以具體行動來表示他脫離本階級的決心，則是在德賽費斯案件暴發後才開始。

法郎士加入這一尖銳的階級鬥爭，不僅表示了他站到無產階級戰綫上的決心，也加深了他對資產階級的憎恨，豐富了他的鬥爭經驗。在這一鬥爭中，他更清楚地認識到資本家的丑惡本質。他意識到，資本家由於害怕工人運動的高漲，必然要對民主勢力進行壓制和迫害。所以德賽費斯案件表面上好像是一個法律問題，但實質上却是一個全國性的階級鬥爭。若來士不遺余力地參加

这个斗争是不为無因的。

4

德賽費斯大尉被軍部誣陷向外國供給情报的案件在法國整整延續了十二年(1894—1906)。左拉是第一个揭發案件真象而大声疾呼反对陰謀的人。因为曾公开肯定德賽費斯的判罪是預先決定并非根据真情，他被判了兩年監禁和三千法郎的罰金。这个案件把法國分成了兩個陣营。在社会党首領若來士領導下的先進的工人，進步的文学家和很大一部分大学生是支持德賽費斯的，人們称他們为德賽費斯分子；帝政派、教会中的人以及法國國家学院的院士們則坚决支持政府的陰謀，認為德賽費斯的罪証是确鑿的，人們称他們为反德賽費斯分子。法郎士在这一战斗中始終和若來士合作，站在德賽費斯分子方面，参加了許多尖銳复雜的斗争。左拉被褫夺光荣勳章时他也退回了他所得的勳章。这个案件虽然在1906年得到了昭雪，但法郎士1908年(左拉已于1902年逝世)出版的“企鵝島”內还充滿了对这个冤獄的憤怒和对德賽費斯的同情。他在1904年出版的“克蘭比尔”仍是德賽費斯案件的縮影和对資產階級保护自己利益的司法丑劇的尖刻的嘲笑。

这个案件对法郎士的思想和行动是有其不可磨滅的影响的。他在1906年7月間巴黎电气工人工会的某集

会上这样说过：

“是德賽費斯案件把我引到社会主义來的。八年前当左拉把參謀部的罪惡親口告訴了我，我就止不住驚愕与憤怒。我再不能閉口無言。我就这样被引到为正义而斗争的道路上來。”

也正是这种对反动政治的深惡痛絕、对被压迫階級的同情以及对集体力量的信心，使他在1905年俄國第一次革命时就对無產階級社会革命發生了無限的同情和敬仰，并且寄予莫大的希望。

5

1905年俄國第一次革命对法郎士的鼓舞和啓發是無法估計的，它对法郎士此后的行动和思想都有决定的意义。他从这一革命中体会到無產階級的無比的力量和光輝的前途，他的怀疑悲觀的态度逐漸为科学的乐观主义所克服，他从此坚定地相信社会可以改善，战争可以消滅，资本主义制度必定滅亡而代以社会主义。他知道，为达到这一目的，必須世界無產階級联合起來一致行动。在同年一个反对屠殺俄國人民的大会上，他明白宣称：“俄國革命是具有世界意义的革命，它向全世界無產階級指出革命的方向和目的，力量和前途，它是一切專制、压榨、人剝削人的制度的威脅。所有的王冠宝座都因之而动搖起來。”他大声疾呼地主張世界無產階級大團結，

他不止一次地發出“各國的無產階級，團結起來！”的口號。他相信沒有武器的無產階級終必戰勝武裝到牙齒的壓迫者。他說：“俄國無產者顯示了沒有武器在手的人們所持的武器是多麼有力！他們對全世界宣布了志在解放人類的罷工，而現在正在實現的罷工，顯示出比槍炮更強大的力量。”^①

他認為只有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可以消滅戰爭和剝削制度。他在1905年的工人夜大學演說里曾這樣說過：

“我們是和世界的無產者站在一起反對一切的暴政的。既然法國無產階級的命運決定於世界無產階級的命運，我們怎能不和他們友愛，不和他們聯盟？我們現在是和戰敗者在一起，可是今天的戰敗者一定是明天的戰勝者。”

他在同一會上還指出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和資本家的世界主義有根本的區別。他說：“世界主義是沒有祖國的，沙皇制度是籠罩全歐洲的反動勢力，是國際資本主義的中心，法國和德國的資產階級都把最後的希望寄托在這個制度上。在無產階級大團結中，國家是民族的組織，在人類目前的狀況下，是應該加以保存的社會生活的必要組織形式。”他說：“各民族的祖國應該是活着而不是死後走入世界的大聯盟。”^②

① 見1908年7月電氣工人工會的演說。

② 見1906年招待葡萄牙哲學家柏拉卡會上的演說。

法郎士在他的一切論著或小說里雖然從沒有提起過馬克思的名字，對恩格斯也只在“享樂園”內提過一次，但僅僅從他對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看法，我們已可以感到他的思想方法已很接近辯證唯物主義。正因為這樣，他才能對社會中每一大變動都作出正確的估計，正如高爾基所說，“他那銳敏的理智從來沒有把事變估計錯誤過。”

正因為如此，每逢國內外發生重大的反正義、反人民的事件時，他總站在前列和反动勢力作鬥爭。1905年他被選為“俄國人民友好協會”的主席，他便不遺余力地聲援那一次起義的俄國工人。他一再反對法國政府答應沙皇的借款。他表示擁護能夠拒絕借款的未來政府。他警告法國人民，如果借錢給沙皇政府，使它能夠在它的廣大而不幸的領土上任意施行槍決、絞死、屠殺、搶劫等等暴行，任意扼殺自由文明，那便是極大的罪惡。

他反對法國政府及一切國家的殖民政策。他從人道的觀點和國家的利益出發來斥責殖民主義。他反對法國政府在非洲和越南的殖民政策。他反對土耳其在亞美尼亞的屠殺。他反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他反對所有帝國主義的戰爭。他說：“自古以來只有過為貿易的戰爭，就是十字軍實質上也只是奪取殖民地產品的戰爭。”他有一句名言：“人們自以為是為祖國而死，實際是為工業家而

死。”^①

十月革命的勝利更堅定了他的信念，增加了他的鬥爭決心。帝國主義對蘇聯的干涉以及封鎖惹起了他無比的憤慨。他公開支持不肯奉命炮轟紅軍的法國駐黑海的艦隊，他說：“一個軍士不服從罪惡的命令是十分偉大的。”不久他又發出了“向蘇維埃致敬”的公開信。他參加了“人權聯盟”之後，又幫助巴比塞主持“光明”社。

1921年他在斯德哥爾摩接受諾貝爾獎金的時候，他的講演詞引起了全歐反动派的責難。他不但當眾公開地重述他對列寧的欽佩，向羅曼羅蘭致敬，還尖銳地抨擊了凡爾賽和約。他說：“結束這次殘酷戰爭的條約不是一個和平條約，而是戰爭的延續。”

7

法郎士自從德賽費斯案件以後，社會活動便越來越積極。他不甘心僅僅做一個文學家，他要絲毫不懈地站在文學戰線上保衛和平。他除了上述一系列的活動外，還經常參加工人的集會。無論是工人夜大學、工人合作食堂或是工人俱樂部，只要邀請他參加，他總是到會而且每次必表示意見或作具有指導意義的演說。

他所以能如此熱心參加工人的集會，首先是因為他

① 見法郎士致加香的信。

热爱工人，他在工人身上找到了他所爱慕的法蘭西民族精神。其次，他認為要使無產階級大團結成為可能，必須提高工人的知識水平，必須使工人了解國際的形勢和努力的方向。更主要的是他很早以來就把教育工人和參加工人運動當作是一個作家應負的任務的一個主要部分。還在1890年他在“世界畫報”上就有這樣警辟的名言：

當一位作家逝世的時候，目下的慣例總是誇獎地說他一生只從事於寫作。這就等於對一個單臂的人誇獎地說他幸而只有一只臂。一個人為什麼要寫作？難道不是為了有所影響，不是為了指導旁人的思想，一句話，不是為了搞政治嗎？

也正是因為他能正確地把一位作家的社會生活和創作生活有機地結為一個整體，所以他的社會生活儘管十分緊張，他的寫作成績就量來說也還是十分驚人的。從1873年出版“鍍金的詩”起，一直到1922年最後一部小說“花朵生活”止，五十年的時間內，他寫了三十六種書，除了兩種詩以外，大致都是三百頁的巨冊，其中還有包括四大冊的“文學生活”和兩大冊的“讓娜達克傳”。如果再加上最近由克洛特·亞弗林娜輯成的雜文集“走向更美好的時代”（已出二冊，輯至1908年止，尚有十二年的雜文待輯），几乎是每年一冊。

法郎士的多產正如雨果、巴爾扎克、左拉、羅曼羅蘭的多產一樣，充分說明只有社會生活豐富的作者才能